

走出困境

周恩来在1960~1965

杨明伟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走出困境

周恩来在 1960—1965

杨明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 / 杨明伟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
ISBN 7 - 5073 - 0682 - 8
I. 走… II. 杨… III. 周恩来 - 生平事迹 -
1960～1965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7425号

走出困境

——周恩来在1960～1965

著 者 / 杨明伟

责任编辑 / 张 宁

封面设计 / 李法明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金剑排版厂

印 刷 / 安泰印刷厂

装 订 / 广增装订厂

850 × 1168mm 32开 16印张 380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5000册

ISBN 7 - 5073 - 0682 - 8 / K · 297 定价：24.00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前言：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3)
--------------------------	-----

1955年秋季以后，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试图打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对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毛泽东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进入195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一艘迷航的巨轮，“乘风破浪”，势不可挡。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的境地。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

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甚至动了“辞职”的念头。“大跃进”，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从化读书，周恩来静心思考建设问题……………（29）

经过“大跃进”的震荡以后，毛泽东向全党干部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使我们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伟大的经济工作。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读完以后，下一步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不久，在周恩来的台历中，留下了许多深夜读书的记录。

1960年2月13日，继刘少奇、毛泽东以后，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国务院、书记处、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有关领导人正式组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这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组织的第三个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这次读书前后用了20天时间，把《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通读了一遍。在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周恩来共作了三次系统发言。

最后一次发言，周恩来重申了贯穿始终的一个问题——读《教科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周恩来的态度毫不含糊：必须批判地学习。他明确地说：中苏两国情况不同，经验不能照抄。斯大林有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也有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斯大林有他成功的一面，但

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要学习列宁时代，不要学斯大林后期。他一语惊人：“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

方针出台，中国进入正式调整时期 (52)

1960年春天，周恩来接到一封署名“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安徽农村粮荒严重，曾发生饿死人事件，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接到同类信件的毛泽东严肃地说：“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

1960年夏天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将整顿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和措施提到了桌面上。秋天，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在六字方针中增加了“充实”二字，并将“整顿”改为“调整”。至9月5日，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有了完整的意义，当月底便正式出台。

八届九中全会，最后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全党确定下来。周恩来呼吁：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也就是在这一年，周恩来感叹地说：我国建国11年来，每年都出口，从未进口过粮食，今年被迫进口粮食了。

调整拉开序幕，欲“动大手术”，先下去蹲点，搞农村调查 (67)

进入1961年，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开始了。然而这一年，领导干部们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却越来越陌生了。周恩来肯定地提出：“只

要讲清楚真实情况，只要情况明了，大家下决心就大，办法就会对了。”

就在调查研究变得必要而紧迫的时候，人们新发现了毛泽东 1930 年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周恩来读后感慨：这篇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他还说：“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像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这时，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动大手术”的文件。而毛泽东则亲自为党内拟定了 11 个重点调查的题目。

周恩来赴河北邯郸蹲点，出发时是午夜，到达时已是第二天清晨。顾不得休息，他便听取了当地干部汇报情况。他选的点，是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的结果，使他彻底地否定了公社办集体食堂的办法。他对毛泽东直言相告：食堂要散伙，“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

和平共处，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 (91)

缅甸领导人曾与周恩来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成功地解决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问题上功不可没。然而，历史上却给中缅两国遗留下了极为复杂的边界问题。周恩来首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个指导性原则：“互让互谅”。并说：“我们的目的都是要把两国的关系搞好。中国不会多占一块土地。”

周恩来向吴努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三点原则性建议，吴努表示：“我们认为周总理的建议是合理的。”周恩

来坦言：“我们愿意从缅甸开始，来解决我们同邻国的边界问题。使它在亚洲起一个示范作用”。为此，周恩来自来到中缅边境，在云南芒市参加了中缅边民大联欢。

周恩来说过：“中缅边界问题不宜久拖。”他有意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边界问题，以使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入人心，也消除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会和担心。周恩来详细研究了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沿革和各种地图，然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各种有不同意见的人作了耐心的解释。

进入 60 年代，周恩来与缅甸领导人开始规划两国达成边界问题协议的日程表。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周恩来为签订边界问题协定和条约的全权代表。与此同时，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周恩来领导的与尼泊尔、蒙古等国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也在有步骤地进行。1961 年 1 月，当周恩来在仰光出席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时，他被缅甸总统授予一枚“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有者”的特制勋章。

文艺界的调整势在必行，周恩来利用“新侨会议”树自己为“活靶子” (118)

夜访新侨饭店，周恩来听到了“五个书记挂帅”的故事。他早就感觉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的文艺工作方法有些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

1961 年 6 月 19 日，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重要

讲话，开门见山便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说着说着，想起自己的一次讲话曾被打入“冷宫”，周恩来流露了点情绪。结尾时他表示：“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7月1日这天，共和国总理邀请新侨会议代表同游香山。登山的时候，艺术家赵丹拽着周恩来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总理，我对您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两人争论起来，最后，面对语塞的赵丹，周恩来只好说：“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1962年初一次空前的盛会，喜忧参半 …………… (134)

踏入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空前的盛会，但却喜中有忧。如果从1960年追述起，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困苦的思索走进七千人大会的，党内对困难形势估计不足，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各执一词，对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行动不力……周恩来非常忧虑。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改变了会议的开法并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刘少奇则在讲话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长期抓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分析深有感触，他在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时，甚至建议将自己的“错误”写进报告中。

正当周恩来等人强调“兼听则明”、“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并赞赏“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的时候，大会上却传出来一些不和谐音：陈伯达迫不急待地表白“不能让主席负责任”；林彪则献媚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后，困难时期并没有过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对形势不怕说“漆黑一团”，尽管党内高层的认识分歧在不断加深，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作出“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重大决策，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自“大跃进”以来的180度的大转弯。

“非常时期”东北行：全面落实国民经济调整

措施…………… (160)

当1962年这个“非常时期”来临的时期，周恩来不得已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办法：“‘精兵’必先‘简政’”，“‘拆庙’，同时‘搬菩萨’。”为贯彻中央有关调整的重大决策，他自告奋勇北上，前往我国重工业基地东北。

东北之行的第一站，周恩来选择了从小学习、生活过的沈阳。这次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却是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时期，周恩来坚定地告诉东北的干部：“困难到了顶点就要走向反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在当年学习、生活过的辽宁铁岭，周恩来有意向小孩子暴露自己的身份，“你认识我不？”“认识，你是周恩来！”老百姓感觉，有总理在身边，困难只是暂时的。到达吉林长春后，周恩来专挑了几个“龙头”企业：一汽、长拖、长影……

在黑龙江，周恩来告诫大家：“我们要相信群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深夜，他赶往大庆油田，到那后便称：“来一次不容易，多看看！”当他再度进入吉林时，直奔少

数民族聚居的延边州。

在东北近 1 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再三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憋着口气战胜困难，你们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建议：抽调足够的人员组成调查组，立即开赴全国乡村进行调查。

接到班禅“七万言书”的前前后后 (191)

探究班禅向周恩来写作“七万言书”的起因，还得追述班禅的经历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关系。身为藏传佛领袖的班禅曾坦诚地说过：“我从幼年起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教育、培养和关怀。”

“七万言书”反映了当时班禅的真实思想，他曾说过：“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和班禅之间约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有事谈清楚了好。”

班禅写的“七万言书”，报告名上署上了周恩来的名子。仔细看了“七万言书”后，周恩来评价：“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并说：“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

周恩来就“七万言书”与班禅谈话，“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制定了“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解决了问题后，班禅“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并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周恩来尽力说服人们：“班禅的事，要分清敌我与人民内

部。”不幸的是，诞生在特别年代的“七万言书”不久便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班禅被批斗以后，周恩来对他倍加关照。尽管周恩来也处境艰难，但经历了“文革”之苦的班禅仍真诚地表示：“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调整还在继续，阶级斗争却悄然袭来 …………… (216)

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是在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展开的。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怎么准备？广大党员和群众提高了警惕，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绷紧了。国内形势亦扑朔迷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甚至非常尖锐的问题。在客观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被不断地夸大。一些本不属于阶级斗争问题的问题，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中。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毛泽东不满意的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估计形势方面的调子太低。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总体上否定“大好形势”的做法心中很不愉快。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带去的议题，仍然是精简、粮食、城市工作等等。对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周恩来仍在照着原先的工作安排抓紧调整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的大会一开，毛泽东先入为主，突如其来地向所有与会者提出了三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阶级、形势、矛盾。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与会者越听越感觉到毛泽东的

矛头所向。受批评人之一的周恩来，讲话中带着有些辩解的成分。紧接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提出：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地位，但要跟调整工作平行。要年年讲，月月讲。要有人去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抓住巨轮沉没事件，亲临第一线主持调查 …… (237)

1963年5月1日下午1时，正当人们沉浸在“五一”节的欢庆中时，中国第一艘开往日本的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突然在海上沉没。“跃进号”出事的消息，当天很快就报告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里：“跃进号”因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陷入深深焦虑中的周恩来立即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派军舰以最快速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营救，并组织联合调查小组。随后，周恩来决定亲自前往第一线指导调查工作。

当中共上海市委和东海舰队的负责人在浓密的大雾中见到走出机舱的周恩来时，惊奇地问：“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调查了！”周恩来一边同大家握手，一边用非同寻常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从机场出来，周恩来直奔会议室亲自主持汇报会。他强调：“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

在调查作业船队启航之前，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一份声明：“‘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系触礁所致，但是，还不能最后排除遭受水下攻击的可能性。”归航之后，新华社奉命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第三份声明：

“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借“跃进号”事件，周恩来告诫工交部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他痛恨地说：“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首访非洲，十万八千里探路 …………… (258)

进入非洲第一站——阿联，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了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场面。纳赛尔总统亲自把一枚精致的“共和国勋章”挂在中国总理的胸前，并授予陈毅“尼罗河勋章大授带”。周恩来感叹：“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随后他大度地致歉：“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

阿尔及尔市政府和市民用两件事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总理的感情。一是专门命名一条大街为“北京大街”，把北京和阿尔及尔连结起来。一是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称号。当本·贝拉总统请求周恩来“赐教”时，周恩来谦逊地说：“才学习三天，第四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本·贝拉称：“周恩来是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

为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打破了以西式两菜一汤来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惯例。品赏到摩洛哥烤全羊的周恩来和陈毅，一再盛赞东道国的饭菜堪称“世界佳肴”。满意的哈桑国王回过头来称赞中国的烹调乃“世界之冠”。他巧妙地问：“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样？”周恩来友好地戏称哈

桑二世：“你可以担任皇帝委员会委员长嘛！”

访非期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突尼斯，热情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见到周恩来，布尔吉巴总统“有话直说”：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词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面对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周恩来并未生气，他求同存异，感激对方的诤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

1964年元旦刚刚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了：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其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周恩来得到报告：虽然政变未遂，恩克鲁玛总统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周恩来断然决定：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至于外交惯例，我们可以打破！患难见真情，周恩来一行从容地走入戒备森严的奥苏城堡。

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难眠。他在考虑：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真诚援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周恩来首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随后这八项原则又正式写入了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

在访非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礼炮，显然是按国

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踏上慷慨、好客、富饶、美丽的几内亚，周恩来进入了杜尔总统所说的“百宝箱”。在异国他乡，周恩来给“杜氏家族”按一、二、三排序，取了一串动听的名字。杜尔总统玩开飞机的新花样，周恩来又冒了一次险，却大开眼界。

在苏丹，周恩来与阿布德主席谈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刽子手戈登。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队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在1884年又被派往苏丹担任了殖民总督。戈登最终被苏丹人民击毙了。当中国代表团到达埃塞俄比亚时，塞拉西皇帝却驱不散高悬在本国上空的美国的阴影。

周恩来把中索友谊追溯到公元九世纪，并称：“我们两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来往”。面对非洲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解释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国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周恩来告诉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

周恩来畅谈“非洲印象”：“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首访非洲，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组与中国的总理进行最好的合作。离别时，机组人员依依不舍，这些荷兰人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

访非报告迟迟没有写成，除了时间紧张、诸事缠身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非是一次丰富、生动且意义深远的出访，必须安下心来才能完成写作。当周恩来将访非内容揉进了《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后，它成为一份独特的出访报告。作报告时，周恩来给了翻译们最高的地位：“我们要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就寸步难行，相对无言，根本说不了话。”“翻译工作是最有政治发展前途的工作。”

导《东方红》，以史诗般的音乐舞蹈再现党的

历史 (313)

受非洲热情奔放的歌舞和上海大歌舞的感染，“动心”的周恩来提议：在国庆 15 周年之际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他表示：这件事我要亲自抓；由中宣部、总政和文化部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指挥部”。

自周恩来亲自批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启动以后，他倾注了更大的心血，甚至在舞台艺术创作和朗诵词、歌词的写作上，他都亲自上阵。他一面排除干扰，一面交代：“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经周恩来亲自批准，1964 年 10 月 2 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公演，获得极大的成功。在随后的半个月內，周恩来连续看了三场。喜上眉梢的演员自豪地说：“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日本客人感叹：“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